

他们行走在敌人的刀尖上

(上接 03 版)

“400小组”组织结构示意图

丁公量 化名粟后
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
书记、主管敌伪军工作上下级
直接
联系人400
乐群上下级
联络员401
朱人达 原名周迪道

张炎 早期联络员

假夫妻
同志406
莫奇 原名徐笑奇

同志

402
周列平 原名周斯明

同志

403
马鹤九 原名冯永青

同志

404
王福舟 原名王福林

同志

408
陈婕(女)

同志

407 张黎(女)

“400小组”
有时不得不提供真情报

乐群是北仑小港人,1918年出生。父亲是宁波和上海两地的富商。她的身份是乐家大小姐,老板的千金。1938年,乐群就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派到苏北军部。

1943年,新四军在浙东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军部派乐群经上海到宁波建立一个交通站,于是,乐群又回到故乡。

乐群的任务就是与朱人达取得联系,由乐群负责、领导这个小组的反间谍情报工作。

乐群来到城工委驻地杜岙村,见到了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主管敌伪军工作的丁公量。

此后,乐群在400小组和丁公量之间,架起了一条联络通道。丁公量向乐群介绍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反间谍小组”的详细情况,“你的代号定为400。今后这个小组就叫400小组。”

乐群到宁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一考察和认识400小组的成员。经过考察,乐群掌握了全面情况,这个间谍小组的成员也看到区委派来的这位“女政委”态度诚恳,水平很高,相互间建立了信任。

此后,乐群一般晚上来。她一来,小组的同志都聚到401号的家,在楼上会客室打牌打麻将。莫奇就

在楼下堂前做针线望风。

铃木手下共有八大密探小组,互相勾心斗角。朱人达组必须提供情报,才能让铃木信任,才能潜伏下来。因此,在乐群的领导下,400小组也会巧打时间差,给宪兵队提供真实的情报,但是,这些真情报实际上是已失效了的。比如新四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秘密开会,但当日寇拿到情报采取行动时,司令部领导已开完会走了。

朱人达不断给铃木情报,虽然这些假情报都失效了,但他们却以为是自己行动迟了,或走漏了风声,因此,铃木对朱人达的怀疑渐渐消散了。

400小组的资金非常紧张,交涉、应酬、走路子、通关营救被捕同志,都要花钱。丁公量指示他们,可以自行筹集。因此,乐群和朱人达等有时把奸商、恶霸作为对象,必要时“敲”他们一笔。第一次、第二次,各向一位汉奸老板敲了100万伪币。第三次竟敲到了1亿伪币,那人原来是为国民党俞济民部暗地里向各行各业商人收税的。

经费有了来源,400小组还按上级指示采购了一些西药、布匹、纸张、日用品……送到四明山。

皮箱装炸药
从上海运往四明山

400小组行走在敌人的尖刀上,经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有一天,朱人达接到指示: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炸药,但无法运出,命令朱人达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正急得要命,朱人达得知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带着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于是,400小组商定由朱人达央求木场和程明,带朱人达和莫奇一起去。朱人达对程明说:“我们夫妻都是土包子,没有到过上海,很想去玩,你们肯带我们去,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

程明一听很高兴,就对木场说了朱人达的意思,木场点头了。

到上海后,朱人达和莫奇顺利取到了一箱炸药,并把炸药放在一只新买的法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几件衣裳。

回宁波的那天,莫奇一手拎着法式皮箱,一手挽

着朱人达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程明的后面,箱子很重,莫奇只得硬着头皮拎,不敢慢半步。

上海火车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朱人达反应很快,拎过莫奇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手里。木场的拎包由程明替他拿着,他空着两手。朱人达对木场说:“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

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你怎么自己不拎上车呢?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

朱人达小声回答:“你们日本人一定会检查我的行李的。这样会影响你上车时间。我不做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虽然一路上多次检查,但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都没过问。

平安回到宁波后,400小组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顺利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机密泄密
“400小组”
处境危急

1945年4月,《浙东报》上发了一篇报道,说铃木政一有厌战情绪,最近把抢来的衣物变卖,将钱寄给日本的妻子,为回国作准备。

铃木政一首先看到报纸,大发怒火。很快,报纸被日军查获,铃木挨了上司一顿臭骂。

因为铃木写信寄钱时,让王福舟替他拿信封信纸,所以,他首先怀疑王福舟。铃木对朱人达大发雷霆,叫朱人达把王福舟扣押起来。

事实上,铃木私下里说过厌战的话,当时莫奇在场,她把自己听到的话,向400小组作了汇报。王福舟又结合自己看到的情况,把两件事综合起来,写成绝密情报,交给乐群,送到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的手中。谁知负责处理情报的技术书记,把它当作揭露日军将要失败的重大事态发展,稍作修改后发在了《浙东报》上。丁公量看到后,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向乐群传达了三个应急方案:一是如果情况紧急,先让王福舟撤离;二是如果敌人追查得紧,400小组处境危急,全体撤离;三是如果有挽回措施,力争一个不撤。

面对这种突发的危急情况,朱人达动起了脑筋。

第二天一早,朱人达就到隔壁徐章翠家。

朱人达问徐章翠:“阿娘,铃木同你讲卖西装卖大衣那天,王福舟在场吗?”

徐章翠答:“那天国芬、阿比在场呀,王福舟不在。”

朱人达有主意了。阿比是伪乡长,经常来宁波,他是日军、新四军两面讨好的人。朱人达马上通过暗线,通知阿比近段时间千万不要来宁波,避免面对质。

同时,朱人达又请徐章翠做了一桌日本料理招待铃木。

吃饭时,徐章翠用日语关切地对“干儿子”铃木说:“你以后到我这里来不要说华语。阿比听了给你传出去了!你看,阿比不敢来了。王福舟很规矩的,嘴巴很紧的,是忠厚人……”

由于徐章翠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铃木相信了干妈的话,而且阿比也找不到了,这事才安然过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400反间谍小组”的成员也胜利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返回四明山根据地。他们还策反了一批敌伪人员,共有60多人,带着一部电台、一挺机枪和许多枪支弹药投奔新四军。